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张君勱

学术思想评传

郑大华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张君勱学术思想评传

郑大华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郑大华著.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5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ISBN 7-5013-1579-5

I. 张… II. 郑… III. ①张君劢-哲学思想-研究②张君劢-评传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7119 号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书名 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
著者 郑大华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首都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579-5/B·92
定价 22.00 元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

(代序言)

戴 逸

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 21 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 20 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 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

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

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 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 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

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 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 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 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 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 1949 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

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 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 20 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

不聊生。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 20 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 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此文原为《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序言,现作本书代序,并加标题。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	戴 逸
导言:一个“徘徊于学问与政治之间”的学问家	(1)
第一章 思想渊源	(31)
德法的哲学思想	(31)
英国的自由主义	(49)
中国的儒家思想	(63)
第二章 发展轨迹	(76)
政治思想的演变	(76)
新儒家思想的发展	(106)
社会主义思想的变化	(149)
第三章 主要著作	(170)
《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	(170)
《明日之中国文化》	(180)
《立国之道》	(200)
《新儒家思想史》	(222)
第四章 学术贡献	(242)
阐发儒家思想	(242)
输入西方学理	(262)
重视治学方法	(280)
第五章 历史地位	(288)

批判西化思潮·····	(288)
反对马克思主义·····	(312)
现代新儒家重镇·····	(329)
附录一 张君劢学术行年简表·····	(353)
附录二 张君劢研究论著索引·····	(366)

导 言

一个“徘徊于学问与政治之间”的学问家

(一)

张君勱，本名嘉森，君勱是他的字，又字士林，号立斋，另署世界室主人。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生于江苏嘉定县城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6岁时启蒙读书，12岁时，奉母命考入上海广方言馆。上海广方言馆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863年（清同治二年）由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请清政府批准设立。与北京同文馆相似，这是一所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馆，招生对象全是14岁以下的儿童。那个时候，广方言馆每周上七天课，其中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英文课除学习英文外，还包括用英文写的数学、物理、化学和外国历史等。学英文的四天只有上午有课，下午老师批改作业，学生则自修，或上体操课。三天读国文，由先生指导看“三通”，作策论。广方言馆的英文课，使张君勱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除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之外，还有若干学问”。

张君勱进入上海广方言馆的那年（1898），发生了戊戌“百日维新”。是年6月11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了摆脱中日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班维新志士

的推动、赞助下，明定国是，宣布变法，随后颁布了涉及经济、军事、政治、文教等内容的一系列变法诏令。由于这些诏令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并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清朝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拼命反对。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党人，变法遂告失败。政变发生后，清政府通令全国，缉拿潜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连广方言馆的大门口也悬挂有康、梁二人的照片。这很自然地引起了年轻好奇的张君勱对康、梁的注意，也激发了他委身国事的兴趣。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震荡和八国联军入侵之打击后，开始宣布实行所谓“新政”，改革官制，奖励工商，编练新军，废除八股，科举改试策论，进行学制改革。学制改革给不太会做八股文，但学过做策论的张君勱提供了进身之机。1902年，他参加了宝山县县试，取中秀才。那年，他16岁。

翌年春，马良（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震旦学院首次招生。此学院的宗旨是招收具有一定国学根底或科举出身之士，用速成的方法，教以拉丁、英、法、德文，以培养中国的翻译人才。当时梁启超在日本主编的《新民丛报》不仅刊登了该学院的招生启事，还刊登了梁写的《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梁启超在是文中指出：“土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一国语言文字者，几不可以人类齿。”而要通欧洲任何一国语言文字，又必须追根溯源，先学拉丁文字，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学问更有根底。张君勱在《新民丛报》上看到了震旦学院的招生启事和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梁启超明确宣布：“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于是他决定入震旦学院学习。尽管震旦学院的学费高得惊人，每半年要缴一百多两银子，张君勱还是想方设法凑足了数额。据他后来回忆，震旦学院的功课与广方言馆的功课完全不同，读的全是拉丁文。马相伯的课也教得特别快，一星期就讲完了一厚册。接着由其他老

师讲西洋哲学和罗马将军泰西多斯的《法国战记》等书。开始时他感到很吃力,常常赶不上功课,好在那时的老师都很有耐心,随问随答,经过一段时间,他才勉强能跟上授课的进度。当时和他同学的还有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党人、国民党元老马君武。

张君勱在震旦学院学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由于家里实在拿不出一百多两银子的学费,他只好中途退学,转入收费不高的南京高等学校学习。

张君勱在南京高等学校学习不及一年,就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不久,即经友人介绍,去了湖南,先后到长沙明德学校和常德师范学堂任教。

1905年冬学期结束,张君勱辞去了在湖南的教席,带着两年间结余下来的400多元薪俸,回到了故乡嘉定。张君勱这次回故乡是遵父母之命与元配夫人沈氏完婚的。第二年春天,按旧的习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但蜜月尚未度完,他就告别了父母和新娘,被宝山县保送到日本留学去了。

这年秋天,张君勱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初入预科,不久转入大学部。本来宝山县给他的公费,是叫他学理化,然而他对理化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法律和政治学。所以为了出洋留学,他虽然在国内勉强同意了宝山县的要求,但到日本后还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改换了专业。这一改违背了宝山县送他留日的初衷,于是半年后宝山县便停止了他的公费,而他自己的存款也早已用尽。幸而他找到了一份能挣钱的差事,这就是为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撰稿,每月稿费可得60余元,足够他和弟弟公权(此时也在东京庆应大学就读)二人的生活开销。但不想1907年冬《新民丛报》停刊,这使张君勱的经济来源突告断绝,生活难以维持。出于无奈,他只好请求亲朋资助。每月亲朋给他13元钱,仅能勉强支付简单的饭费,生活极为拮据,有时连买块手巾的钱也没有,兄弟二人只好将一块手巾一剖为二,再破了,各用四分之一。兄弟因不同

校,每周聚晤会餐一次,由于没有钱,只能以烤山芋为美味佳肴,其清苦可以想见。

张君勱的生活尽管十分清苦,但他的学习还是很用功的。他后来曾说过,他与现代学术的正式接触,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当时教他课的大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教授,如政治学有浮田和氏,国际法有中村进午,宪法有有贺长雄,财政学有田中穗积,经济学有盐泽昌贞。特别是浮田和氏教的政治学,给他的印象尤其深刻,直到晚年他还记得浮田和氏穿着和服和木屐上课的样子。政治学在早稻田只是选修课,选修者甚少,张君勱那一届仅他一人选修。课本是洛克的《政府论》。开始时,浮田和氏一本正经地站在讲台上讲课,后来因为看书不方便,便和张君勱并肩而坐。浮田和氏为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君勱从他那里学得不少知识。张君勱虽然留学日本,开始到日本时也进过日本的语言学校,但他的日文并不怎么好,仅能勉强看书,说话和写作都很困难。好在当时早稻田大学除了讲义是日文的外,所用的参考书几乎全是英文的,如威尔逊的《国家论》、柏基氏的《宪法》、萨里门的《经济原理》、奥本海的《财政学》等,而且考试也允许学生用英文写论文,这样英文就成了张君勱的求知工具,因为他从广方言馆开始就学英文,水平相当不错。

早稻田大学虽用的是英文参考书,但教授们讲课时常提到德国学者及其著作,如Wagner、Schmoller、Mayer及Laband等人,这使张君勱对德国的学问产生了好感和兴趣,并暗暗立下了今后一定要去德国留学的决心。

当然,张君勱在求学的同时,也没有忘怀政治,他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在他东渡日本求学的前一年(1905),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革命组织——革命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亦即三民主义为自己的纲领,积极从事和领导全国人民的反清革命活动。也是这一年,清政府为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立

宪派,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本来只是一场骗局,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则假戏真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他们一方面督促、要求清政府真心实意地加快立宪的步伐,另一方面则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要不要反清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双方论战的阵地分别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当张君勱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之日,正是论战最激烈之时,他以他的笔墨和智慧投入了这场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论战,先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些反对革命、主张立宪的文字,并因此而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最坚定的追随者,是1907年10月成立的“政闻社”的骨干分子,积极参加政闻社的立宪活动。

1910年夏,张君勱在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不久,即起程回国,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留日生活。

张君勱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清学部为留学生举行的考试。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鼓励更多的青年学生去国外留学,决定定期举行回国留学生的考试,按照所考成绩赏给他们进士或举人的功名,并授以官职。尽管此时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清武装起义,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并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清王朝的统治行将土崩瓦解,但张君勱还是决定回国参加考试,以期实现他在此前不久给梁启超信中所说的派政闻社社员进入政界、广占势力的谋略。

该期主试注重工科,张持的政治学文凭只能以70分纳入所试各科,平均计算。张自认此次考试无甚希望。然考试结果却使他喜出望外,各科竟全得了满分。主试者为示奖励,将他的文凭从70分增加为75分,这样平均计算的结果,得了个优等。1911年(清宣统三年)5月,清廷根据所考成绩,授予张君勱翰林院庶吉

然而，正当张君勱踌躇满志、准备实现自己的政治谋略时，辛亥革命爆发了。1911年10月10日夜，驻扎在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枪声迅即传遍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一些本来反对革命的立宪派审时度势，很快转入到革命阵营一边，甚至个别清廷的地方督抚在革命洪流的裹挟下，也宣布与朝廷脱离关系。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

武昌起义后，张君勱返回故乡宝山县，任县议会议长，并先后与其弟公权等共同发起成立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从事政党斗争。1912年10月27日，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联合靳云鹏的共和统一会、广东的国民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等团体，正式成立了民主党。民主党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张君勱、孙洪伊、向瑞琨等30人为常务员，其政纲是：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

民主党成立不久，即发生了所谓“外蒙问题”。本来，武昌起义后曾力主联合袁世凯，以借其势力，造成一大政党的张君勱，这时已对袁上台执政以来，“因循坐误，一事不举，内无整理之可观”的内政措施感到强烈不满，今又闻此外交大失败，便不能再保持沉默，乃与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蓝公武等集议十日，于是年11月21日创刊《少年中国》周刊，著文抨击袁的内外政策，特别是他的《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一文，其言辞之激烈，比之当时革命党人的一些抨袁文章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君勱的文章，无疑是一篇声讨袁世凯的檄文，在全国激起了很大反响，《少年中国》周刊发行量也因此而大增，每期印行两千份还供不应求，出版当日即销售一空。当然这也激怒了袁世凯，他不仅下令查禁了这篇文章，还派人将张君勱监视了起来。张君勱在国内无法安身，于是，在梁启超（1912年10月回国）的劝告下，于1913年1月起程去了德国。就此言之，张君勱不仅是原立宪派中